哲 学 研 究

经典解释与宗教中国化

——道安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的学术启迪

张 志 刚

(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若把佛教的传入视为“中外文化的首次大规模、深层次的交流互鉴”,且把佛教看作“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典型”,回溯其历程的开端,考察其先驱的创举,揭示“佛教中国化”的根由,无论就“重读中国佛教史”还是对“续写中国宗教史”,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读东晋高僧道安(312—385)的“五失本”与“三不易”学说可以发现,早在“佛教中国化”之初,前者就从词语、语法、文体等方面,探索了“经典翻译的本土化、民族化”;而后者则开示了“经典解释的难题、哲理与境界”,堪称对世界宗教经典翻译史与解释学的方法论贡献。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道安的诸多弘法贡献首屈一指“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此乃“佛教中国化的基石或根基”;而道安在经典翻译与解释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尤数“三不易的首要义理”——“经典解释的时代性原则”最值得浓彩重笔;因其既可令人深思世界宗教史的思想根源,又能令人顿悟“续写中国宗教史”的智慧灵感。

关键词: 经典解释;道安;比较研究;宗教中国化;续写中国宗教史

中图分类号:B 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1-0010-10

在中外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可以感悟到这样一种里程碑式的现象:一种新的见地,往往能为人们开辟新的视野,拓展新的思路,展现新的前程。近几年我国“政、教、学”三界所热议的“宗教中国化”,就其“义理”或基础理论意义而言,便可作如是观,因为这一新见解能启发我们,通过“重读中国宗教史”来“续写中国宗教史”。近期重读东晋高僧道安(312—385)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笔者深有此种学术感悟。

一、发见关键: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

众所周知,中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除了道教是“土生的”,其他四大宗教起初皆是“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可谓“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互鉴”。中外专家一般认为,在传入中国的几大宗教里,佛教不但堪称“宗教中国化的典型”,且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楼宇烈所言:“佛教在中国传入、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的过程是文化交流中非常好的典范,这是一种和平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平等状态下的相互吸收,交流的同时又互相丰富了自己……这是(中国)佛教史的概况。尽管在印度本土佛教于 13 世纪就绝迹了,但在中国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并处于不断发展中。”①因此,如果把东晋高僧道安视为“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那么,他的弘法实践、思想贡献,尤其是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对我们提炼“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并“续写中国宗教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张志刚,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宗教中国化’的基础理论建构”(项目编号:18DA2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文明与世界宗教”。

① 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7 页。

史”,有什么重要的学术启迪呢? 这便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关于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开拓性贡献,我国学界一向赞赏有加。譬如,梁启超著《佛学研究十八篇》里多处高度评价道安,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方面:(1)“中国佛教的创业者”,“佛法确立,实自东晋”;“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即道安,下同)始……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我盖不敢言”;“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2)中国佛教信仰、宗派、建制的开拓者,“原始佛教及哲理的佛教之输入,安其先登也”;中国人之弥勒信仰,自安“创始”;(道安)“遍注诸经,而犹精《般若》,可谓‘空宗’最初之建设者”;“中国沙门之以‘释’为姓,自道安始耳”;“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3)中国佛经翻译及其理论的奠基人,“安为中国佛教界(佛典翻译及其理论的)第一建设者。虽未尝有所译述,然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译业创始之功,端推道安”;“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裒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前此讲经,惟循文转读,安精义通会,弘阐微言,注经十余种,自是佛教界有疏钞之学”;“翻译文体之讨论,自道安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①

又如,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指出:“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艰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道安之在僧史,盖几可与于特出高僧之数矣”;“两晋之际,安公实为佛教中心……安法师于传教译经,于发明教理,于厘定佛规,于保存经典,均有甚大之功绩。而其译经之规模,及人才之培养,为后来罗什作预备,则事尤重要。是则晋时佛教之兴衰,奠定基础,实由道安”;“综自汉以来,佛学有两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安公实集二系之大成。”②

再如,打开《方立天文集》(六卷本),其首篇《道安评传》一落笔就指出: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佛教领袖,是一位博学的佛学家,是“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研究道安的生平思想,对了解与总结中国古代佛学史和哲学史,都是十分必要的。③ 方广锠著《道安评传》则收笔于如下历史地位评价: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人物”,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他对佛教理论与佛教典籍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教团的健全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均功不可没。④

复如,赖永海主编十五卷《中国佛教通史》里认为:“道安一生的佛教活动反映了当时全国佛教的发展状况;道安是当之无愧的具有全国影响的佛教领袖,对中国汉地僧团以及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⑤魏道儒主编十四卷本《世界佛教史》里有下述更加全面的概括:“从治理僧团到整理经典,从完善僧团制度到研究佛学义理,从组织译经到培养人才,从弘教下层民众到获取朝廷支持,道安几乎在佛教思想和实践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都有积极探索,都获得显著效果。东晋是佛教名家辈出的时代,而在推动佛教适应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工作之多、影响之深,没有人可以与道安相提并论。”道安的弘法贡献主要有五方面:(1)在组织和管理僧团方面,道安参考域外佛教戒律,制定管理制度,规范僧侣的生

---

① 以上评价归类为笔者所为,可按这三类引文中的“分号”,依次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1)第 3—4、139 页;(2)第 140、10、95、139 页;(3)第 155、269、139、166—167、247 页。

② 以上用“分号”划分的三段评价,依次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第 187、191、227 页。

③ 方立天:《道安评传》,《方立天文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佛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④ 详见方广锠:《道安评传》,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8—280 页。

⑤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58 页。

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致力于僧团的道风建设、制度建设;(2)道安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争取政府的支持,使佛经翻译从民间分散进行开始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3)道安在研究般若经典基础上提出新的翻译理论,在研究般若思想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4)道安系统研究佛教经典,强调从整体上梳理和把握佛教义理,不受某部经或某位译者的误导,全面整理佛教典籍,推动佛教史学进步;(5)提出僧人不用俗姓,以“释”为姓,增强佛教的宗教统一意识,强化佛教僧侣的整体认同感。①

上述我国学术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已对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开创之功做出了较为全面且充分的评价。本文基于这些主要研究成果,力图进一步探讨如下问题:在道安的诸多弘法成就里,何者“最关键或最基本”,最能从根本上促成“外来佛教的中国化”,且最能在学理上启发我们“续写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呢?按笔者的看法,最能促使我们深思上述几点的不二选项就是:道安毕生倾力“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从研习、翻译,一直到全面梳理典籍、系统诠释义理。为什么道安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呢?为推进上述思考,笔者提出一条新的研讨思路,这就是“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

二、推进思路: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

著名基督教思想家、教育家赵紫宸(1888—1979),曾从“基督教与佛教中国化相比较”的角度发表如下议论:

> 基督教与佛教不同;中国人不曾去求基督教,因为中国人不曾感觉到去求的需要。西国人来传教,是西国人自己内心中迫不得已的遣使;他们心中受命于天,只要打开中国的门路,即不问其所凭借的威力都从哪里来……于是乎,传教有条约,有西洋的政治力作后盾……基督教既不仗本身的灵光,而仗外国势力以为播散之法,则中国的信徒当然不免于仗洋势,以自卫,以欺人,而中国的人士当然不能不有人民教民的区分,视教民为汉奸,为洋奴,弄得“火烧昆冈,玉石俱焚”。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既有作洋奴汉奸的嫌疑,则其所信的国教,当然不能深入而浸润中国的文化。基督教与中国民族的扞格不入,这未始不是一个甚为不幸的理由。②

赵紫宸是“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先驱”。不必怀疑,他的上述议论是怀着真诚的“中国心与民族情”,并以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来反省“西方基督教”在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国的复杂背景及其社会后果的,这种反省的目的即在于,重新认识“本真的基督教”,促使“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社会。所以,他有如下坦诚之言:

> 我们是中国人,活在中国的环境里,然而我们亦吸收世界的文化与基督教,亦曾在中国的思想境界里优游。
>
> 我们所应深思熟筹的是如何可以保持我国文化的精神,如何可以开拓此文化使得与世界文化融洽而继增。③

因此,通过具体分析“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宗教的六大端理由”,赵紫宸得出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结论:“佛教是中国人求来的,基督教则反之,是西国人依仗经济与政治侵略而传入的”;如果中国人需要宗教的话,必须中国人自己去求;“求”有三端:“求诸行”“求诸经”“求诸文”,这三者就是指“要做到身体力行”“要到发源地求经求教”“要自己翻译经典”④。笔者以为,

① 详见魏道儒、李利安:《中国汉传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 6 世纪)》,魏道儒主编:《世界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2—160 页。

② 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原刊于《真理与生命》(1935)第九卷,第五至六期,现收入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636 页。

③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原刊于《真理与生命》(1927)第二卷,第九至十期,现收入《赵紫宸文集》(第三卷),第 268 页、第 270 页。

④ 这里讲的“要自己翻译经典”,其中“自己”一词是指“本土的信仰者”;而“翻译”自然包括“理解与解释”,所以笔者在下文将采用“经典翻译与解释”概念。

这里所强调的最后一点——“要自己翻译与解释经典”,可使我们顿悟,为什么东晋高僧道安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建设者”或“第一座高峰”,为什么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不能不深思他所建树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的杰出贡献。

不言而喻,对各大宗教传统来说,经典乃是信仰传承的根据。然而,在以往的世界宗教史研究中,中外学者大多只就“某种外来宗教的经典翻译活动”来谈论其重要意义,而未能从比较研究的学术视野,充分认识“要自己翻译与解释经典”,实属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能否本土化、民族化和处境化,即能否真正融入其传播地的文化、民族与社会的关键所系。关于这一学理判断,我们不难从中外宗教史上找到典型的类比例证,并加以深入地理论分析。

三、类比例证:“俗语佛缘”与“大众化圣经”

留心品味赵朴初(1907—2000)为《俗语佛源》写的“前言”,不禁令人掩卷深思。赵朴老回忆:他在“文革”期间之所以起意梳理“俗语佛源”,就是想写一些“与佛有缘的人间语话”。据报道,现在有些人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他们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口含佛教成分,因为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表达方式,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相对、绝对、手续”等,都是佛教语汇,来自佛经翻译;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恐怕我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赵朴老进一步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大量翻译西文论著,他们用的许多术语,是我国古代佛经译师创造的,我国学人不知根源,忘却祖先劳绩,以为是日语,连日本人错用的中译词也以讹传讹,沿用至今不觉。举个例子,“相对”与“绝对”的“对”字,应该是“待”字,佛经里用“相待”“绝待”来表达相互依存的缘起道理;日本人读“待”,音同“对”字,故误写为后者,假如不研究“俗语佛缘”,就不会发现此类差误。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晚年所说:“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①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也是一位彪炳西方史册的宗教经典翻译家,他的一大贡献就是运用新的翻译与解释理论,译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众化《圣经》”。路德之所以能使《圣经》译本大众化,除了宗教改革运动所不可或缺的经典依据、教义解释、神学思想等内在要求,还有两方面更具体的、相互促动的客观条件,这就是欧洲大陆文艺复兴以降“经典翻译本土化或民族化的需要”与“经典翻译与解释理论的创新”。路德生活的年代,由文艺复兴所掀起的“重新发现经典意义”的翻译活动,在西欧各国文学、历史、科学、哲学、宗教等领域如火如荼。就宗教领域而言,当时教会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打破“老教”(相对于“新教”)——天主教会的“经典与教义解释垄断权”(只有教会神职人员才能用拉丁文《圣经》讲经布道),让广大普通信众重新理解“信仰的意义”,路德主持翻译的“第一部大众化《圣经》”便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新的翻译实践须有新的学理支撑。路德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颇受西方翻译史研究者的重视,概括起来,他在《圣经》翻译理论上的新见地主要有四:1.《圣经》翻译要采用“人民的语言”;2.《圣经》翻译要注重“语法与意义的联系”;3.《圣经》翻译要遵循的“七条原则”;4.《圣经》翻译要“集思广益”。② 我们在此着重分析路德的第一点译理创见,其余内容留待后文参考分析。

为什么《圣经》翻译要采用“人民的语言”呢?这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说起。16 世纪的德国翻译界主要致力拉丁语的文学经典与宗教经典的翻译。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德国翻译界也一直存在“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起初前者占上风,但到 16 世纪后者渐成主流,主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译者认识到,德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民族语言,富有自己的词汇和语法,其独特且严谨的表达风格不应流失于拉丁语原著的逐词逐句直译。正是在此背景下,路德一方面深受古罗马神

① 详见赵朴初:《〈俗语佛缘〉前言》,《赵朴初文集》下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06—1107 页。
② 详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64—68 页。

学家、语言学家奥古斯丁(St.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的思想启发,认为"译者不能成为单词的奴隶",地道的翻译应把外文原著化作本民族语言;另一方面则力主"为人民而翻译《圣经》",即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德国平民信徒,也能读懂《圣经》且理解其"精神实质"。因而,路德讽刺直译派:只有傻瓜才会收罗拉丁字母来讲德语,要搞明白怎么讲德语,必须回家问你的母亲,到街头观察孩子们、老百姓是怎么说话的;再来照此进行翻译,他们才能读懂你的译文。路德就是这样在同道们的协助下,首先根据希腊文版译出《圣经·新约》(1522),接着依据希伯来文版译出《圣经·旧约》(1534)。这两个译本以德国图林根一带的公文语言为基础,不仅汲取了中东部、中南部方言的精华,而且创造出大量新的词汇,以致被誉为"德语的典范"。① 恩格斯评价:"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与曲。"②

前述赵朴老的回忆与路德的例子可谓异曲同工,若把二者综合并加以比较,可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如果说前者从"俗语佛缘"的微观角度透析了佛经翻译与解释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层影响,后者则以"人民语言"的宏大叙事印证了《圣经》翻译与解释"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就一般学理而论,这是否意味着"经典翻译与解释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在中外文化史上均是"外来宗教扎根于其传播地的首要条件或关键一环"呢? 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一关键问题,具体且深入地分析道安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的杰出贡献及其学术启迪。

四、深化研讨:从"字义解释"到"语言观比较"

后人记述或研究道安生平思想的文献论著,落笔之处几乎千篇一律,大多援引现存年代最早的资料、南朝梁代僧史传学家释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里的《道安法师传》,一开头就提道安12岁出家,因相貌丑陋,师父轻视,遣其种地3年;直到他向师父恳求读经,且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才受器重,为他受戒,任其游学。从客观的历史眼光来看,这段记载虽有"以貌取人"之嫌,但却刻意表明,道安从学法之始就"心系经典"! 在此后的游学、弘法生涯中,道安是如何研习佛经、组织译经、整理经录、阐发经义等,均有史册和论著详述,这里不再重复。笔者想要深入分析的是,道安所建树的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五失本、三不易"。下引完整的论述出自道安所撰《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竞竞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 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③

以往的研究者对上引"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大都给予充分肯定,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所例举梁启超、汤用彤等人的评价,类似的评论几乎遍见近二三十年发表的道安专著和佛教通史,如认为"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是对佛经翻译的困难和经验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有重要影响;"可以视为佛经初传期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系统总结";"总结历来佛教经典翻译的经验,为后世的翻译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是"第一次对佛经

---

① 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第64—65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7页。
③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页。

翻译实践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是“影响深远的汉译佛经翻译理论”等。

然而,细读这些评论,笔者在领教现有成果的同时,也心生“一种学术不满足感”,即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字面意义”来理解与评价“五失本、三不易”的,其通常表达形式就是,把“五失本”主要理解为汉译佛经过程中的“五种需要改动胡语原本的情况”,而将“三不易”主要解释成“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例如,在诸多学者所做的字义理解中,下述解释既有代表性又简明扼要:“五失本”主要是指,“语法要适应中文的结构;文字要做适当的修饰;颂文的重复句子要删略;连篇累牍的重颂要删节;反复重述的内容要略去”;“三不易”主要是讲,“古代特有的习俗不易译得适合于今时;佛说的微言深义不易译得使凡愚也能理解;传译的人都很平庸,一般不易译好”。①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者大多采取的上述说法,虽然能从字义上尽可能准确地解读“五失本、三不易”,但在此研究基础上,我们还应更深入地探讨其理论内涵及其学术启发。那么,如何深化这方面的探讨呢? 我们可以借助两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宗教哲学语言观的比较研究”;二是“宗教经典解释理论的比较研究”。这里先谈宗教哲学语言观比较,后一方面的比较研究留待下一节探讨。

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1995—1990)曾以比较的眼光指出:作为中国哲学组成部分的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the negative method),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正好相反,使用的是“正的方法”(the positive method),致力于突出差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② 从这种比较研究观点来看,我们能否断定,道安当年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不但在语言表述形式上,而且在理论内涵、特别是方法论上,主要采用的就是“负的方法”,即“负面的或否定式的宗教哲学语言观”呢?

上述方法论判断,可得到现有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持。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里有一章,专门研讨“中国佛教的语言观”,其中有如下论述特别值得回味:

> 最高真理是语言难以表达的,但弘法又需要借助语言来表达,为此,佛教对语言的表达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正面的肯定式与反面的否定式。前者是通过显示事物的属性来诠释事物是“是什么”,称为“表诠”。后者是通过排除事物的属性来诠释事物“不是什么”,称为“遮诠”。佛教尤其是般若学系统,认为语言只能表达相对的现象,作用是有限的。最高真理是超越多种相对现象之上的绝对者,必须通过“不”“非”“无”“离”“绝”等否定式的表述来表示最高真理。如龙树就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来显示绝对的真理,显示绝对真理的中道。同时,也有一些重要佛教经典除阐述“遮诠”方式外,也阐述“表诠”方式,对如何运用语言宣传佛法,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方式。③

笔者以为,上述两位先生的研究心得,至少可给我们带来这样两点学术启发:其一,现今研究者应该意识到,道安当年言说“五失本、三不易”时,主要采用的是古老的佛学,尤其是般若学的传统语言表达方法——“负面的或否定式的语言表达方法”;其二,尽管道安论说“五失本”与“三不易”均采用“负面的或否定式的表达方法”,但现今研究者恐怕不能机械地理解此种语言表达方法,即只从字面上来一并解读“五失本”与“三不易”的理论意义,或许如方先生指出那样,这二者灵活地运用了“表诠”与“遮诠”。这后一点便是接下来所要着重分析的。

五、分而论之:“五失本之表诠”与“三不易之遮诠”

这里所谓的“分而论之”,力图“接着上述两点学术启发说”,提出并论证一种新的理论诠释:若知“五失本、三不易”主要采用了“负面的或否定式的语言表达方法”,道安又是灵活运用“表

① 方立天:《方立天文集》第一卷,第 5 页。类似的理解与评价,可以参见方广锠:《道安评传》,第 249—250 页;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第 567—568 页;魏道儒主编《世界佛教史》第三卷,第 152—155 页。

②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下),赵复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英汉对照版,第 542—543 页。

③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98 页。

诠”与“遮诠”的,那么,我们便应着眼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分别诠释“五失本”与“三不易”的主要理论内涵,即把前者主要理解为“可用表诠方法所一语道明的佛经翻译理论”,而将后者主要理解为“不得不用遮诠方法所一言难尽的佛经解释理论”。这里需要明确两点:一是,“一语道明”和“一言难尽”二词,非指“行文字数”,而指“思想内容”;二是,有必要重复上述逻辑约定,即此种“分而论之”并非割裂“五失本”与“三不易”,而是为了深入阐发二者的“主要理论内涵”及其“思想递进关系”。下面是笔者的分析与论证思路。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前面提到路德在《圣经》翻译理论上的数点贡献,其中他所提出的“翻译七条细则”特别值得在此一提。为了让德国大众读懂《圣经》,路德认为:(a)可以改变原文词序;(b)可以合理运用助词;(c)可以合理增补连词;(d)可以略去无法对译的词语;(e)可以把单词译为词组;(f)可以把“比喻”译成“非比喻的”,反之亦然;(g)注意“译文变异”与“意义解释”的准确性。① 这里罗列路德的翻译观点,并非为了简单对比道安的“五失本”说法,而是旨在得出如下推论:尽管“德译圣经”不同于“汉译佛经”,但从“理论类比”来看,路德所讲的“七条细则”不就是适应德译的“七失本”,而道安所讲的“五失本”不就是合乎汉译“翻译细则”吗?进而言之,虽然道安是用“负面的或否定式的语言表达方法”来论述“五失本”的,但其语义与路德的翻译思想并无二致,即二者都是以“表诠方式”来陈述“经典翻译的诸多细则”的。

如果说道安所讲的“五失本”主要是“一种经典翻译理论”,且采用“表诠方式”而使读者可从字义来直接理解其翻译思想,那么,他由“五失本”而进一步阐发的“三不易”,则应主要看作“一种经典解释理论”,且因采用“遮诠方式”而使现今的研究者不能不深析其理论创见与学术启迪。为论证这一要点,笔者再添加一则比较例证,这就是著名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布尔特曼(Rudolf Bulman,1884-1976)所提出的“解除神话理论”(Entmythologisierung)。

从思想史或学术史来看,布尔特曼堪称“一位思想观念的开拓者”,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明确地提出了一代代宗教经典解释者所不能不回应的一大难题:作为信仰根据的古老经典,何以能对当代读者具有不朽的意义?身为基督教神学家,布尔特曼的研究重点是《圣经·新约》。他尖锐地指出,从文本而来,《圣经·新约》里的世界观及其语言描述方式显然是“神话的”,而现代科技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控制,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类“思考自然与自我的方式”,已发展到没有人能维护“神话和奇迹”的地步了,例如,现代人相信现代医学知识,有病便去医院,还有多少人能相信“驱鬼治病”呢?然而,正视现代人的知识状况与思维方式,绝不意味着否定“经典启示”,因为“语言描述”与“经典启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并非一回事。布尔特曼一再举例论证,所谓的“解除神话”应该理解为“一种解释学的程序与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废除神话”,而是要用解释学的新观念来“破译神话”,从而把古老经典的真实内容阐发出来。因此,当代宗教经典解释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即在于:如何破译原有的“语言描述”,用当代读者所能理解的表述方式,真正阐释“经典启示”的现实意义。②

布尔特曼的上述宗教经典解释理论,在西方学术界颇受重视,他被誉为“现代《圣经·新约》解释学之父”。若与这种现代理论相比,且从整个世界宗教经典解释史来看,我们能否认为,道安所提出的“三不易”理论,早在千余年前就已阐发了宗教经典解释学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何以能让“跨时空、跨文化的当代读者”读懂“古老的经典”,且能真正理解其“恒久的意义”呢?

六、学理提炼:道安“三不易”理论的主旨要义

当然,若要做出上述重要评价,我们便须破解

① 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第 66—67 页。

② 参见布尔特曼:《新约圣经与神话学:解除新约圣经福音宣告的神话问题》,S.M. 奥格登编:《新约圣经与神话学》,陈俊辉译,台北:使者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9 页。

“三不易”理论所采用的“遮诠方式”,一改以往研究者大多拘泥字面、逐句解读的直观方法,而是由表及里,从“遮诠”到“开示”,即由字义上的“负面说法”——“不是什么”来解析其语义上的“正面说法”——“应是什么”。按此诠释逻辑,笔者承接前述“比较研究的推进思路”及其例证分析,试把道安“三不易”所着重表述的佛经解释理论转换为“具有一般意义的宗教经典解释方法”,将其整段论述所蕴含的主旨要义提炼为如下环环相扣的经典解释观念。

1. 所谓的宗教经典是深含普遍意义的。此为对“三不易”首句——“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的学理提炼。以往的研究者几乎都对此句不够重视,但在笔者看来,因其首先言明“何谓宗教经典”,该句可被视为整个“三不易”理论的逻辑前提。细读前引整段论述可见,道安是紧接着“经文翻译上的五失本”来阐发“经义解释上的三不易”的,此句打头的一个“然”字,显然笔锋一转,深刻开示了“五失本”所要追求的经典解释目的,即经典译文的本土化、民族化与大众化,旨在表达宗教经典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因而,我们不难从此句悟出这么一番学理:一部经典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如《般若经》所讲的“三达心”)的彻悟或启迪,其意义无疑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覆面所演”),能使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觉悟或应对宇宙、世界与人生的根本问题。

2. 经典意义的解释要力求适应当今时代。此为对“三不易之一”的学理提炼。这一解释观念作为上述逻辑前提的第一个推论,可谓“三不易的首要义理”:既然宗教经典是深含普遍意义的,经文所记述的圣者言论必然会适应不同的时代,而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又是变化不已的(“时俗有易”),所以,经典意义的解释理应适合当今时代(“圣必因时”)。

3. 经典意义的解释要力求通俗化、大众化。此为对“三不易之二”的学理提炼。这一解释观念应理解为前述首要义理的逻辑推演:尽管圣者的智慧是凡夫俗子远远不可企及的(“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但经典意义的解释者仍要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使千余年经文的微言大义得以传承,将其注疏得通俗易懂,使之下达历朝历代的平民百姓(“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4. 经典意义的解释者要心怀敬畏、知难而进。此为对“三不易之三”的学理提炼。这一解释观念可理解为前三个论点的归纳总结:宗教经典从背诵到成文,乃是众多圣者兢兢业业的劳作成果(“阿难出经……五百六通迭察迭书”),所以,今日释经者定要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且能力平凡,要将流传千年的经典意义阐释出来,使之适用于当代人,且做到通俗化、大众化,便须怀有敬畏心,知其所难,不懈努力(“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

关于上述学理提炼,有必要说明一点,这就是笔者的见地并非“孤论”。就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至少有两例可以支持上述四点学理提炼中的部分论点。例如,钱锺书点评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当推此篇;《全三国文》卷七五支谦《法句经序》仅发头角,《学记》所谓‘开而弗达’。《高僧传》二集卷二《彦琮传》载琮‘著《辨证论》,以垂翻译之式’,所定‘十条’‘八备’,远不如安之扼要中肯也。”①这段评语里的“译梵为秦”堪称“点睛之笔”,仅用四字便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旨在表达的“佛经翻译的民族性、地域性与时代性”。然而,从该著“一六一”节来看,钱先生广征博引,主要圈点的是“五失本”在中外翻译史上的理论贡献,而对“三不易”却没做具体考释。

又如,浏览胡中才近年发表的多种道安研究论著,可发现他比以往研究者更注重解读“三不易”理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三不易’实际上讲的是把佛经译成适合各国国情,能被各国人民所接受,是不容易的事情。一是传播佛教必须因时制宜,与时共进,而不同时代之俗是有变化的,删除高雅的古俗以适应今时之俗,是不容易的事

① 钱锺书:《管锥编》(四),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82 页。

情;二是传播佛教必须因地制宜,而佛教的传播要使百国君主统治下的各种民俗都能适应,不是易事;三是佛经距今(东晋时期)千年之久,对佛经衡量判断只能以现在的理解为标准,而此又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以上三种情况,主要讲译佛经要因时、因地制宜,既有个'洋为中用'的问题,也有个'古为今用'的问题,所以,翻译时难度很大,能力平平之人是难以胜任的。"①这段解读中的"适合国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等提法,显然与前述 2、3 两点学理提炼有些契合,但不尽意之处在于,胡先生对"三不易"的整个解读仍像以往学者那样,主要限于字面理解,且从负面意义上径直将其表述为"佛经翻译的三种困难"。那么,笔者所尝试的"祛遮诠化的学理提炼"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重要的收获与启迪呢?这便是本文最后所要总结的。

七、扼要总结:"重读的收获"与"续写的启迪"

从"提出问题"到"寻求解答",本文的分析与论证可喻为"一曲六折"。回应开篇立意,着眼"重读中国佛教史"与"续写中国宗教史",笔者试把全文的问题意识、逻辑思路、理论收获与学术启迪等概要如下:

首先,若把佛教的传入视为"中外文化的首次大规模、深层次的交流互鉴",且把历经千百年磨合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看作"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典型",那么,回溯其历程的开端,考察其先驱的创举,从中揭示"佛教中国化"的根由,无论就"重读中国佛教史"还是对"续写中国宗教史"来讲,显然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因此,若如以往研究者一致认为,"佛教中国化"始于东晋,而高僧道安在输入佛理、创建宗派、制订仪轨、整理经录、翻译经典等方面的诸多贡献堪称厥功至伟,那么,我们便可基于以往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究,就道安的诸多贡献而言,何种建树"最关键或最根本",堪当"佛教中国化的基石或根基"?通过引入"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新思路,本文认为,道安的诸多贡献首屈一指"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唯其如此,他方能被誉为"中国佛教的创业者、中国佛教界的第一建设者、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座高峰"等;否则的话,道安的所有其他作为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充分论证道安之于中国佛教史的上述首要贡献,本文试以"中外经典翻译的类比例证"——赵朴初所考释的"俗语佛源"与路德所创译的"大众化圣经",进而得出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符合的学理判断":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经典翻译与解释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均是"外来宗教扎根于其传播地的首要条件或关键一环"。

根据上述学理判断,本文摆脱现行研究中的习惯套路,即主要囿于字面来解读道安的佛经翻译理论,转而从"中西宗教哲学语言观比较研究"的辩证视角,试将"五失本"与"三不易"分而论之:即一方面把"五失本"主要理解为"以表诠方式所直陈的经典翻译理论",且以路德的"翻译七条细则"为比较对象,据此断定道安的"五失本"理论早在上千年前,就从词语、语法、文体等方面探索"经典翻译的本土化、民族化"了;另一方面则将"三不易"主要理解为"以遮诠方式所表达的经典翻译理论",再以布尔特曼的"解除神话理论"为比较参照,通过"祛遮诠化的学理提炼",以重新发觉道安的"三不易"理论之于世界宗教经典翻译史与解释学的方法论贡献。

最后论及"三不易"理论的方法论贡献,如果本文所尝试的"祛遮诠化的学理提炼"基本上能够成立,那么,其中最值得圈点的就是前述"三不易的首要义理"——"经典意义的解释要力求适应当今时代",我们可将其凝练为"经典解释的时代性原则"。这一原则之所以值得浓彩重笔,主要理由即在于,道安所言"圣必因时",不仅早在"佛教中国化"之初就开示了"经典的价值",也不但远远早于国际著名经典诠释学家布尔特曼等人,仅用四字箴言便道明了"经典解释的难题、哲

① 胡中才:《道安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2 页。

理与境界”,更令人沉思之处还在于:一部世界宗教思想史从根本上说是否即为一代代人重读经典、解释经典,以不断发掘各大宗教传统的思想智慧,从而使其教义教规裨益于时代进步、社会和睦、文明昌盛呢? 这一根本的着力点是否也是“续写中国宗教史”的智慧灵感所系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7 月在考察宁夏银川新城清真寺时深切地指出: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深深嵌入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我国的各民族和各宗教是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

Scriptural Hermeneutic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What Dao An'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Hermeneutic Theory Can Teach Us

Zhang Zhig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f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can be seen as the first large-scale, in-depth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ts outside world, and Buddhism can be taken as an exemplary ca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non-native religions, re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investigating the innovative efforts of its forerunners and by demonstrating the cause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shall prove to be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oth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for renewing and upda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 Rereading the theories of Dao An (道安, 312–385), an eminent Buddhist monk of the East Jin Dynasty, who was known for his ideas of “five cases of miss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五失本) and “three difficulties” (三不易), we may find out that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 idea of“five cases of miss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has touched upon the indige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vocabulary, grammar and genr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idea of “three difficulties” has conveyed the challenges, principles and levels of success for scriptural translation, as both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of world's religious classics and the hermeneutics involved. It is thus possible to suggest that among Dao An's many accomplishments in promoting Buddhism, the “siniciz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scriptural hermeneutics” should be regarded as his top achievement, which has since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In particular, the temporal principle for scriptural translation, the primary idea of Dao An's “three difficulties” theory, is most worth studying and expounding, for it will help the scholars to reflect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world religions, and to become inspired in their efforts to continue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

Key words: scriptural hermeneutics, Dao An (道安), comparative study,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 to continue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

(责任编辑　刘曙光)